

A traditional Chinese red ink wash illustration. The upper half features a large, gnarled pine tree with dense, needle-like foliage. The lower half depicts stylized, swirling waves.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red ink on a light-colored background.

慈溪英烈

第1輯

1985. 8

烈 英 溪 慈

第一輯

中共慈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浙江省慈溪县民 政 局

一九八五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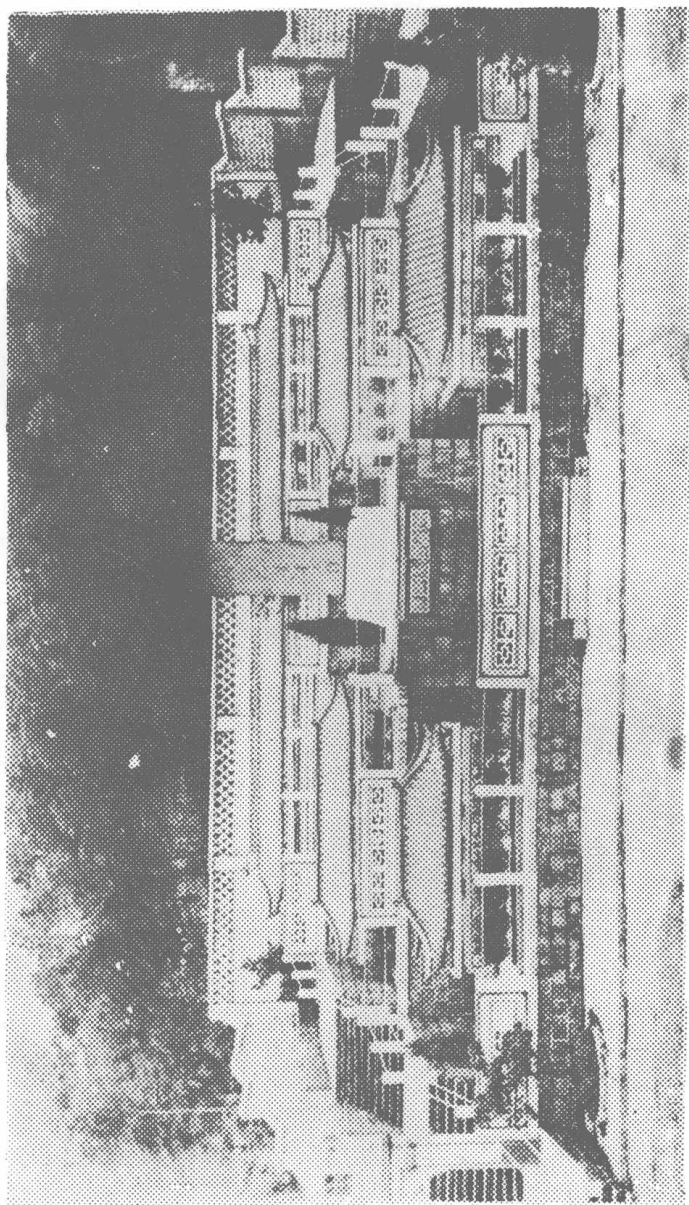
封面题字：谢仁安

封面作画：陆一飞

宁波日报印刷厂

承 印

屹立在白洋湖畔的慈溪县革命烈士陵园



前 言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这是六十多年前(1922年)，周恩来同志在柏林写下的悼念黄爱烈士的诗。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到处是一派兴旺的景象。这正是无数革命先烈艰苦耕耘所得的收获。我们慈溪南接四明余脉，北濒杭州湾畔，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曾燃烧过盐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创立过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也在这块土地上，曾武装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建立过游击根据地；也在这块土地上，当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曾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少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

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我们今天能过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今天的处境虽与过去不同了，但先烈们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

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为了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对广大人民特别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大家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努力奋斗，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和选编了《慈溪英烈》第一辑，供大家学习、宣传。

由于我们水平低，对革命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都缺乏经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大家指正，并请继续提供革命烈士史料，以便出好《慈溪英烈》的续辑。

目 录

- 杨贤江烈士的一生……………杨 光 (1)
- 费德昭传略……………据《余姚党史资料》(第二期) (16)
- 郭静唐传略……………姜枝先供稿 (22)
- 沈邦祺传略……………唐武声整理 (27)
- 三北红梅
——记沈一飞烈士……………唐武声整理 (38)
- 血可流志不可屈
——记杨小群烈士……………余姚县妇联供稿 (49)
- 决不能与叛徒死在一起
——记徐英烈士……………据《慈溪县妇运史
专辑》(第一辑) (55)
- 光辉的一生
——记刘索琴烈士……………据《慈溪县妇运史
专辑》(第一辑) (65)

杨贤江烈士的一生

杨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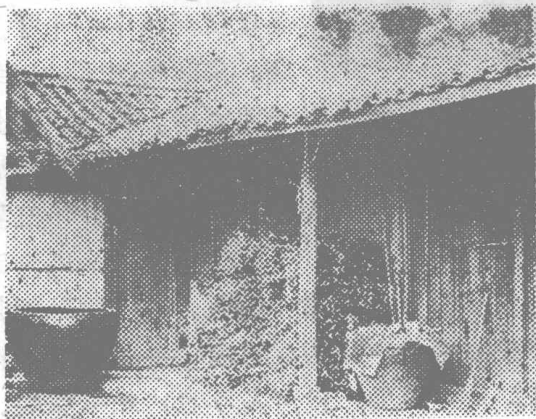
杨贤江（1895——1931），又名英甫，笔名李浩吾、柳岛生等。浙江余姚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三一年八月，在日本病逝。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杨贤江出生在余姚下垫桥（现属慈溪县长河镇）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杨树芳，以缝纫为业。

母亲方氏，在家种三亩园田帮助家用。杨贤江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七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十一岁进离家二十里的郑巷溪山初级小学读书，十三岁进第泗门诚意高级小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师半年。一九一二年秋季，杨贤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一师”校长经亨颐，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办学热心，在全国教育界负有盛名。他延揽的一批著名学者，如李叔同、夏丏尊、

胡公冕等，不仅学问渊博，教育认真，并且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以之熏陶学生。杨贤江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认为师范生应当养成高尚的品德，具有丰富的学识，强毅的体魄，才能“为人师，为人范”。因此，他十分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在每个学期开始时，他都根据学校的作息时间和课程表，制定了日程表，精心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何时复习功课，何时阅读课外书，何时锻炼身体，何时记日记，甚至对一些生活小事，也都有具体规定，井井有条，严格执行，从而养成了他一生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革命斗争生活时，只要条件许可，总是坚持这样有规律的生活。

杨贤江在“一师”五年，各课成绩优异，曾获得全校优等生奖。他博览群书，在学校的藏书楼和孤山省立图书馆中，凡与课业有关的新书，总是他借得早，读得快。他常给《学生杂志》投稿，获得该杂志特别征文的第一名，把所得稿费，用来购置新书。他还从夏丏尊老师自学日文，初步掌握了两门外文。由于他读书很多，知识广博，德智体全面发



杨贤江故居

展，加之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品学皆优，成为全校知名的模范生。

学生时代的杨贤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答应亡国的“二十一条”。杨贤江看到报上刊载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时，寝食不安，焦急万分。但有的同学却无动于衷，他在日记里愤然写道：“吾不知其究竟知国家否？究竟知中国即吾之国否？”袁世凯称帝下令改元“洪宪”时，他愤激地对同学朱文叔说：“几千年来皇帝的根子好容易才拔掉了，怎么人民如此不中用，会让他把民国又改成帝国，”于是，由他弹琴，和几个同学一起唱起纪念辛亥革命的歌曲来。他把歌词的最后一句“长毋相忘”唱得特别响，特别激昂，以表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愤懑和反对。

一九一七年秋，杨贤江“一师”毕业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监处和教育科当职员。他一面工作，一面听课，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同时，又参加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学习。在南京期间，他和武汉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相互通讯，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浪潮，促使杨贤江大量接触新思潮、新学说，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年的十月，他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南京分会书记。一九二〇年七月，他和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人，被推为该会第二届学会评议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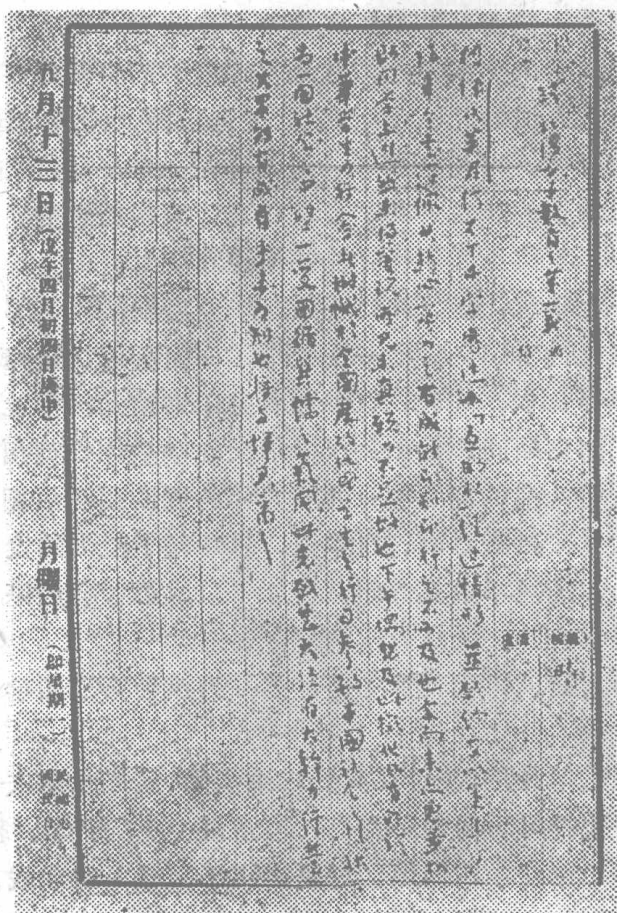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九月，杨贤江离开南京高师，到广东肇庆高要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任教务主任，准备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四门课。可是，由于粤桂军阀混战，补

习所无法开办，他被困在肇庆五十多天，目睹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的疾苦，加深了对中国军阀政府腐败统治的认识。

一九二一年一月，杨贤江从广东到了上海，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学生杂志》编辑。

杨贤江到上海时，正当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不久，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开展建党活动。商务印书馆是中共上海发起

杨贤江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三日写的日记



组的一个重要活动阵地。在编译所编辑《小说月报》的沈雁冰，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他与杨贤江成了知心朋友，后来他回忆杨贤江时说：“也就是在担任了《学生杂志》的编辑的时候，贤江兄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之所以接受马列主义，也是从那时候起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杨贤江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一九二二年五月，他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与恽代英一起，负责学生运动方面的工作，并协助恽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一九二四年，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正式委员。同时，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被聘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

在这期间，杨贤江还以《学生杂志》编辑工作为掩护，担任着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工作。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青年团组织与党中央联系，就是通过杨贤江的。他还协助张秋人、宣中华等同志，来杭州、宁波等地，开展党团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如到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担任该会历届的评议员或候补评议员，在学会内部积极开展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他到当时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和上大附中任课；被聘为上海景贤女中史地文科教授，多次到该校组织的暑期学术报告会和上海学生会举办的夏令营讲学会讲学；他和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赵祖康等九人，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担任过上虞春晖中学教务主任，

每周一次往返于上海和白马湖之间。他还热情地支持家乡余姚青年组织进步社团，帮助他们创办《余姚评论》和《余姚青年》。

一九二三年秋到一九二五年夏，杨贤江进入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后改为心理学院）读完全部课程。

杨贤江入党以后，担任了这么多党的领导职务和繁重的社会工作，还到复旦大学读书，但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他的主要工作仍是编辑《学生杂志》。这六年，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国人民的觉悟空前高涨的时期。杨贤江紧跟时代的脚步，把这个已经被人讥为思想混沌的学生课艺性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彻底的改革，成为以革命思想教育团结青年学生的阵地。这期间，他为《学生杂志》写了大量的社评、专论，立论新颖，观点鲜明，战斗性强，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他在二月五日报出的《学生杂志》第十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青年》的署名社评，指出：“列宁的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革命行为，都是我们做青年的好模范。”还发表了介绍列宁生平的文章和三幅列宁的照片。同一期上，杨贤江为反对封建复辟势力掀起的一股复古读经逆流，抓住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策问式的国文会考这一典型事件，发表了《国故毒》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的教育青年，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急得封建学阀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暴跳如雷，公开致函攻击杨贤江。杨贤江毫不示弱，连续发表文章反击。恽代

英、萧楚女等同志也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痛斥复古派，加上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声援，沉重地打击了顽固势力的复古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组织了“学生干政”和“学生入党”问题的两次专题讨论，发表了不少讨论文章。他还请恽代英同志解答学生提出的关于政党方面的问题。这种生动活泼的专题讨论，澄清了学界脱离政治的糊涂思想，对青年学生教育很大。不少学生纷纷写信给杨贤江，表示要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党。

杨贤江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答问”栏，亲自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大至世界大势，国家命运，革命事业，社会发展，人生意义。小至个人的兴趣爱好，恋爱婚姻，升学求业，处世交友，以至读什么书，怎样记日记等等，杨贤江都细心地给以解答指导，或请专家解答。从一九二三年四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通讯、答问刊载。在这些读者来信中，有的称杨贤江为“贤江兄”，有的直称“贤江”，可见当时他与读者关系之亲密。

在这六年中，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具名论文、社论将两百篇，通讯一百多封，答问千余则，可见他为教育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呕心沥血，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从而也获得了青年学生的敬爱，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和知心朋友。这时期的《学生杂志》，销数大增，甚至远销海外。不少青年学生，受它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已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迄今还很怀念杨贤江。李一氓同志在一篇纪念杨贤江的文章中作过这样的评价：“他与恽代

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杨贤江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制造了“五卅”惨案，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杨贤江满腔热情地站在运动的前列。为了反对被右派把持的上海市教职员联合会改变反帝爱国运动的方向，他和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同志，联合进步教职员三十余人，发起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印发宣言，成立演讲团，到工厂、商店、学校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上海的“五卅”运动，在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右派、买办文人的镇压破坏下，趋向低潮，为此，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为学生联合会编辑的《五卅后之上海学生》一书所写的序言，除驳斥买办文人胡适之流对学生运动的诬蔑外，还指出了中国的青年学生在民族革命中担负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今后学生运动的方向，应到工厂中去，到附近农村中去，宣传组织工农群众，走学生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在二十年代，杨贤江提出这样的主张，确是高瞻远瞩的了。

上海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遭受挫折后，反动势力嚣张一时。这时，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公然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强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登报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的国民党党籍。为此，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筹备员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等，于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组成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林钧、杨之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随着北伐军的进展，大革命进入高潮，上海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日趋高涨，杨贤江担任了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青年部长。这时，恽代英、沈雁冰等同志已先后离沪，他的工作更为繁重，不得不离开了他已工作了六年的《学生杂志》编辑部，全力投入革命领导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上海工人曾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杨贤江参加了这两次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杨贤江奉命到杭州联络北伐军。在杭州，他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已很尖锐，右派日益嚣张，因此，他特别注意宣传国民革命的正确主张。他在一次国民党左派各县县党部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不要幻想地主、资本家会自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当时，宣中华曾邀请杨贤江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杭州《民国日报》编辑，他因上海方面工作急需他回去而未接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赶回上海，参加了这次起义。

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参加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筹建工作，起义胜利的第二天，临时市政府就宣布办公，立即得到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来电承认。可是，奉蒋介石密令，驻军龙华顿兵不进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这时却趁工人起义胜利之机，进军上海，抢占已被工人武装解放的各机关部门，并百般阻挠上海市政府的成立和行使职权。蒋介石也急急忙忙从芜湖赶到上海，加紧与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

力的勾结，妄图压倒和削弱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革命力量。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各团体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了补行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在有卅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严正致词，他说：“上海革命之工人，已有武装之预备，应该保存其原有势力，与革命的军队一致对付帝国主义者”；“我等已得之政权固须保存，我等已有之革命势力亦当扩大”。杨贤江的发言，充分表达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意志，但正在磨刀霍霍决心反共的蒋介石，对此当然置若罔闻，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下午，致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正在出席上海市党部全市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为蒋介石、白崇禧的威胁所吓倒，毅然举行了临时市政府就职典礼。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会议主席杨贤江宣告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诞生。

可是，蒋介石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假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派吴稚晖、钮永建、何应钦、白崇禧等右派头目，成立所谓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公然篡夺了上海市的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大权。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期间，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右派制造的反共事件层出不穷，反革命谣言四起，但杨贤江却以大无畏的精神，用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的名义，发表了《告上海学生书》，号召大家发扬“五卅”精神，加强团结，勇往直前，努力扫荡反革命势力，以达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白崇禧的蓄意破坏下，上海临时市政府仅仅接收了一个教育局。在艰难的局面下，杨贤江挺身而出，担任起代理局长的领导职务，在报上发表改革教育的谈话。这